

论高攀龙水居诗的哲理意蕴及诗史意义

兰石洪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 明末大儒高攀龙水居诗富有深刻的哲理意蕴。这些诗表现了高氏悠雅的生活情趣和时代震怖带来的心灵颤动,体现了哲人潜心性理的思辨色彩和宁静心境。高氏水居诗“画化”的“化境”之美,去玄言的技巧之高,逼近陶、韦的平淡诗风,其艺术成就拔帜于一般哲理诗人之上,典型地体现了江南地域文学的特征,代表了东林诗社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从而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关键词: 高攀龙 水居诗 哲理意蕴 诗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05 (2021) 01-16-23

DOI: 10.14040/j.cnki.52-1004/k.2021.01.003

高攀龙(1562—1626)作为“东林派下最大的学者,他的学术较顾宪成深入……其所造开大深刻,在明末学者中为翘楚,与刘宗周并称大儒”¹,其诗亦在宋明理学家中独具特色,四库馆臣《高子遗书提要》评曰“诗意冲澹”²。钱穆认为高氏诗“率真清淡”³,视他为“理学诗宗”,选高氏诗一百多首入编《理学六家诗钞》。高攀龙其学、其诗与水居生活密切相关。他从三十四岁到六十岁一直居家读书讲学,三十七岁时在漆湖⁴中一洲上筑室水居、可楼等,作为静坐读书之所。高攀龙对水居及环境的选择和设计,体现了他对儒家实践理性(善)和审美理性(美)以及智者乐水文化和谐统一文艺思想的深刻体悟。水居“以水为垣,豁然四达”(高攀龙《水居记》),洲外环水,水外有堤,堤外是外湖,湖外又有诸山环绕,高氏又在水居“环堑作池,周池中植芙渠,红白嫣然,绿碧鲜洁,堤间植垂柳,杂以桃李”⁵。晚清薛福成《修复高子水居记》敏锐地发现高氏能领悟圣道“孔颜乐处”和圣人“喜怒哀乐未发气象”的精微奥妙,“集东林之大成”,关键在于他多年水居静坐、观水玩水“植基于静者之效与”的体验⁶。水居诗记录了他体悟圣道的精神体验,形象地描绘了水居周围的太湖风景,表现出了高氏悠雅的生活情趣。后世关于高氏“水居文化”的书有三部:廖纶、杨殿奎编纂的《高忠宪公水居志》,高氏后裔高鏊泉、高长康编撰的《高子水居志补编》以及钱基博撰写的《高子水居菁华录》。钱氏收录高氏水居诗仅八十二首,实则高氏诗集还有七十多首写水居生活或以江南水乡为主体背景的诗歌,两者合计超过高氏传世诗歌(四百四十三首)总数的三分之一,⁷这些诗确实是高氏诗歌菁华所在。研究高氏水居诗不仅有助于深入理

作者简介:兰石洪,1973年生,湖南岳阳人,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诗词典籍及文化研究。

1 张学智:《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8页。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高子遗书》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22页。

3 钱穆:《理学六家诗钞·自序》,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4 按,“漆湖”即今无锡南郊五里湖。

5 秦沅:《水居记》,高鏊泉、高长康纂辑:《高子水居志补编》卷一,清宣统三年铅印本。

6 钱基博:《高子水居菁华录》卷一,《无锡文库》(第二辑)《惠山古今考等》,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影印民国十年铅印本),第369页。

7 高氏殉难后,门生陈龙正崇祯间编刻《高子遗书》《高忠宪公诗集》等书,雍正间高氏从孙高崧重刻《高忠宪公诗集》(此书收高氏诗最全,共四百三十六首,另可从《高忠宪公诗手稿真迹》《高子未刻稿》等书辑补高氏集外诗七首)。本文所引高氏文、诗除说明外,分别出自《高子遗书》(崇祯本)、《高忠宪公诗集》(雍正本),恕不一一出注。

解一代儒宗哲学思想的生成背景，而且有助于深化拓展晚明哲人之诗的研究，本文拟探讨高氏水居诗的哲理意蕴及其诗史意义。

一、高氏水居诗的哲理意蕴

高氏诗中“水”的意象触目皆是，检索高氏四百四十三首诗，“水”字出现九十三次，“湖”“海”“江”等字出现一百五十六次，“雨”“露”“雪”等字出现九十三次，水意象出现频率之高在古代诗人中实属罕见。水居诗是高氏与水为邻、玩水奥赜的诗意映现。其《水居记》云：“主人偃息其中，以水为娱，泊然自得。或凭轩而眺，或隐几而瞑，或曳杖而游，目之所赴，意之所遇，魂魄之所安，无非水也。”其门人马世奇《高忠宪公诗集原序》云：“第先生游息馀闲之所为”，“皆先生陶写性灵，为学人直指天根之语。”¹这些诗围绕水居（或水）周边环境及作者心境展开，所写不过是诗人“以水为娱”的闲适生活。与渊源老庄却褪去哲思色彩，纯粹表现主体隐逸之乐的“渔父文学”不同，也与一般诗人着力表现山水意象的审美意蕴有别，高氏水居诗呈现出“亲水”哲学的气象和智慧。高氏门生陈龙正对其师学术文章知之甚深，他在《高子遗书序例》中深刻地阐述了儒者“烟霞洒落”（体物遣兴）作为文字益世而被世人忽视的重要意义：“文字当垂，惟取益世。益世惟三：其一关切身心，其二开物成务，此易知也，三者烟霞洒落，足以澹嗜好而资清真。理义从此实，故不身心而身心；才识从此浚，故不世务而世务。不学者则以为玩弄景光，逍遥日月而已矣。此在观者自得之。先生语言文字中，往往见此。出于逍遥之口，与出于学人，自是不同，口不同也……总之心不同也。”²在陈氏看来，高氏水居诗应视为学人借助“烟霞洒落”澹泊身心以排遣“人欲”臻至“天理”的重要手段，与儒者“关切身心”“开物成务”的积极入世情怀是一致的。杜甫、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的闲适诗当作如是观，高氏水居诗体现的“理义”“身心”的哲理意蕴亦作如是观。³

第一，表现高氏水居生活的悠雅情趣

高攀龙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山明水秀的太湖边度过，高氏喜欢游历山水，其《可楼记》自言少时“慨然欲游五岳名山，思得丘壑之最奇”，曾多次到杭州、武夷等地访友问学、游览山水，又想到“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于是建水居、可楼等履足他誓志求学的夙愿及饱览山水的嗜好，高氏水居诗多写水居生活的悠雅情趣。《水居三首》其二可视为高氏多年水居生活的一个缩影：“少敦诗书好，长嗜山水娱。一朝谢簪组，而来居菰芦。青山当我户，流水绕我庐。窗中达四野，喜无垣壁拘。桃柳植长堤，菱荷被广渠。徒侣有渔父，比邻惟田夫。虚堂白日静，恍若游黄虞。兀兀日趺坐，忻忻时读书。会兹动静理，常得情性舒。恬然以卒岁，去此将焉如。”此诗写于水居筑后不久。高氏三十一岁被授予行人之职，次年即因直言上疏痛责首辅王锡爵排斥异己而被贬谪为揭阳典史，不久弃职返家，返家时三十四岁，又先后经历本生父母去世，直到三十七岁时他心神稍定，决意建水居、可楼摆脱烦扰，以期专心探究圣人之道。此诗写高氏以水为邻、静坐读书、体悟性道的生活乐趣，赏心悦目的山水，色彩缤纷的花木，朴实厚道的乡邻，静如太古的环境，和簪组凡俗的官场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幽居四乐》诗意地描写古代四位高士管宁、陶渊明、陈抟、邵雍安贫乐道的幽居生活乐趣，意在以古代高士自许，传达高氏对水居生活的快然自足和恬然自适。如其三云：“我爱邵尧夫，缅怀发清吟。当其在百原，危坐必正襟。会此丸中理，宁受外物侵？心空百虑息，气静天根深。爰以风月谈，聊见羲皇心。”邵雍在洛阳百原建“安乐窝”，外绝名利，内求自乐，吟咏不辍，精研象数，穷究儒理，成为一代儒宗。高氏的志趣与理想与之相似，故借

1 高攀龙：《高忠宪公诗集》，《无锡文库》（第四辑）《高忠宪公诗集等》，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清雍正十二年高崧刻本），第1页。

2 陈龙正：《几亭全书》卷五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十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影印清康熙云书阁刻本），第569页。

3 据曹辛华老师《论杜诗“遣兴体”及其诗史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三期）统计，杜诗遣兴体诗几近于杜诗总量一半，遣兴体对诗人有着重要的排忧娱悲、平衡情绪作用，也表现了杜公“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的民胞物与情怀。理学家诗的遣兴体诗更应视为儒者借助烟霞光景不断克服“人欲”、臻至“天理”的重要手段。

邵子以自喻。又如《湖上闲居吴子往归季思适至》写高氏与挚友相聚水居、默默自怡的相得之乐：“正尔山水间，念我烟霞友。春风吹微波，日暮倚杨柳。我友惠然至，童仆喜奔走。相别叹经时，相逢虑非久。所欢得晤言，欲言仍无有。默默各自怡，一室闲相偶。夜深不能寐，明月在东牖。”

第二，水居诗表现晚明风云变幻时局对他的微妙影响

探索性理的终极目的在于践履，高氏六十岁复出入仕后在《答徐若谷中丞》（其一）中说：“今天下已极敝，岌岌乎不能支，吾辈不及时矢心戮力，忘躯为国，即碌碌无以异于吾辈平居所讥评者。他年瞑目之际，一念不能自安，千秋常抱恨矣。”¹其平和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诗人忧念时局的心，而钱谦益说他“家食几三十年，闭门学道，时方钩党，风涛喧豗，优游自得，有终焉之志”²，谓高氏仿佛闭门学道、不闻世事的优游淡泊之士，这只是看到了表面现象而已。仔细寻绎高氏水居诗，不难发现东林党人倡言讲学、议论朝政，招致政敌攻讦、“钩党”迭起的“风涛喧豗”时局对他心态的微妙影响。如《水居闭关》：“碌碌风尘似马牛，暂栖烟水作眠鸥。劝君莫漫闲来往，惊得眠鸥不自由。”此诗写于天启三年（1623）八月，是年高氏于太仆寺卿任上，出差江南抵家后闭关水居修养，东林党人面临日渐扩大的阉党势力对朝中正派人士逼压的严峻形势，诗人以“眠鸥”自比，流露出对朝廷群小喧嚣乱政的不满和希望摆脱朝廷是非纷争漩涡、淡定心境的志趣。又如《夏日闲居》其四：“事简人方贵，身闲道未穷。乾坤蒿目外，朝野察眉中。跌坐落残照，孤吟倚晚风。何当问老骥，吾意已冥鸿。”《水居饮酒诗》其一：“忧危不为己，放逐岂忘君？但愿常太平，把酒看白云。”在冥契万物、啸傲林泉的风致中不乏“乾坤蒿目外，朝野察眉中”的忧愤和不以一己得失为念、心忧天下的胸襟。高氏《水居八首》写于天启五年（1625）六十四岁时。是年四月，高氏被削籍为民；十月，张纳参东林，东林书院毁。高氏“屏迹湖干，自称湖上老人，不见一宾客，不谈一时事。花鸟为伴，啸咏自娱，谓大臣见废时，义当然”³。此组诗模仿杜甫《秋兴八首》以抒怀，有回乡饱览太湖美景和饱尝家乡风味的快意，有对青山绿野的默契和亲和，亦有重返水居的亲切和真味（“何事驱车淄洛尘，归来烟水味逾真”）。但更多的是借景物含蓄抒发他正道直行却受诬陷的满腔愤懑。“湖海自容长往客，乾坤谁是独醒人。……屈指世间何限事，无如此地且垂纶”（其二），这是对世事多艰的忧虞及众醉独醒的悲愤；“万事云霄看燕雀，百年天地有金兰。尸居未可言匏系，屈指山林事更难”（其四），这是对群小得意（“燕雀在云霄”）的讥刺和欲挽狂澜却遭罢职放逐的辛酸；“一自幽居寄水滨，了无藩蔽豁吾真。……清时合有吾曹在，主管箕山颍水春”（其六），这是对自己人格清白的自剖⁴和调羹济世才华的高度自信；“无端时论纷纷甚，卧听蛙声遍野塘”（其七），这是对阉逆噪（蛙声）、逼人太甚的怒火；“未须蒿目忧时事，闻道明君信直臣”（其八），最后收束组诗，这是高氏对自己晚年复出⁵从政所为的充分肯定和对熹宗皇帝的热切期待。这组诗一改高氏早年平和静逸的诗风，激烈的情感出之以淡静的意象，婉而多讽，深得屈骚、杜诗之妙。

第三，高氏水居诗记录他体悟圣道过程的精神体验，富于哲学思辨色彩

水居风景虽然极美，水居生活虽然优游自如，但高氏用心所在不是流连风景，雕琢景物，亦不是知足保和，恬然自适，而是类似邵雍在《伊川击壤集序》所推崇的“以物观物”“吟咏性情，曾何累于性情哉”⁶，即他的目的在于借助观物来领悟哲理。他说“观天地则知身心”（《高子遗书》卷一《语》），
“天理者，自然之理，非人所为”（《尊闻录序》）。高氏于优游自得中体认天理，在观景过程中融入自己对哲理的领悟，在鲜明生动的形象描写中，如蜻蜓点水般拈出发人深省的哲思睿理。如《静坐吟四

1 高攀龙撰，唐文治校录：《高子别集》卷三，《无锡文库》（第四辑）《高忠宪公诗集等》，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影印民国十五年太仓陆氏刊本），第371页。

2 钱谦益：《跋高存之邨居诗》，《牧斋初学集》卷八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4页。

3 华允诚：《高忠宪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五十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4 按，此处“对自己人格清白的自剖”与阉党污蔑高氏贪污相关。

5 按，“晚年复出”即是高攀龙六十岁复出，官至左都御史。

6 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0页。

首》，记录了高氏借助不同的观物环境，叙写自己摆脱尘世“人欲”臻于“天理”澄明之境的哲理体悟。其二云：“我爱水边坐，一洗尘俗情。见彼逝者意，得我幽人贞。漠漠苍苔合，寂寂野花荣。潜鱼时一出，浴鸥亦不惊。我如水中石，悠然两含清。”这首诗形象地表达了高氏不断排除私欲、澄澈心境的精神历程。“幽人贞”出自《周易·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王夫之释云：“盖君子不幸，当小人干上之世而处其下，无能自达之象，故曰‘幽人’。惟其正志以居，修身守道，与天下之凶危相忘，物自不能加害……刚而能中，于道无失，可以坦坦于履。”¹此诗当系高氏辞官隐居期间所写，他身处晚明乱世，东林讲学又为世侧目，故自谓“幽人”，常来水边静坐以鉴照淡定自心。

“潜鱼时一出”用比喻手法写心中私欲（“潜鱼”）蠢蠢欲动，“浴鸥亦不惊”则写祛除私欲不乱自心，经过不断澄定，清洗心中杂念，终于臻至坚毅刚贞的“水中石”境界。这四首诗，其一描写高氏静坐山中观物以敛心；其三写他从欣欣生意的鲜花中，体认一己通于万物的自得之情；其四写静坐松下、怀慕松柏的高风亮节，以期精进于儒家人格浩然刚健的境地。这四首诗从辞藻选用、意象美感、意境营造等来看，置之于历代诗歌中亦不失为佳作。高氏的很多诗，从字面看来虽流连风景，实则隐有攀援哲理之路的心理体验和感悟，比一般的诗人之诗要耐读得多。

第四，水居诗还表现高氏静坐沉潜圣道的宁静心境

高氏认为“人身内外皆天也，一呼一吸与天地相灌输”（《语》），要谛听天地之妙、与天地同呼吸，须由静入定。“遇水则止”，浩浩太湖吸纳了各种声响，不着村落的水居环境“静如止水”，高氏于此中静坐悟道，易进入“心空百虑息，气静天根深”（《幽居四乐》其三）的妙境，在静观万物的消息增长中玩味圣道之奥赜。高氏水居诗体现了他静坐悟道的宁静心境，如诗题含“静坐”的诗有十首，“坐”字在诗中出现三十九次，这些诗“静”的意味非常突出。或表现环境之静，如《湖干四时歌》其三：“水溶溶兮林静，云晶晶兮昼长。绿荫浓兮扫径，黄鸟窥兮移床。”让人感觉到静寂中万物的欢悦和心境的澄宁；或表现收视反听、观照自心之静，如《枕石》：“心同流水净，身与白云轻。寂寂深山暮，微闻钟磬声。”心如流水白云，微弱钟磬音更见出心境的微澹恬漠；或表现更高境界的“道境之静”，如《夜坐》：“夜气清无睡，披衾隐坐幽。疏星催晓色，片月冷孤舟。气入虚无杳，身俱一榻浮。溪声枕边去，活活未曾休。”澄澈空明的心境融入天地的浑茫和淡静之中，“由静入定，由定生慧”，宁寂中潜藏着生生不息的流动之气。

二、高氏水居诗的艺术成就

高攀龙既不同于其他哲理诗人的“理过其辞”，亦不同于诗人之诗的“为诗而诗”，其水居诗独特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高攀龙善于将枯燥刻板的理学家生活“画化”

探求圣道、枯燥板刻的理学家生活素材，在高氏笔下化作形象可感的动人画面，呈现出情景交融、晶莹剔透的诗歌意境。水居的迷人风景在高氏笔下得到了充分体现。四季花柳粲然，“菱蔓摇漾，莲花芳敷”（《水居》其二），“绿叶青天下，翠幄苍崖前”（《静坐吟四首》其四）。远处太湖万顷碧波，九龙山青翠山色，盈然几席，“九龙山似翠屏立，五里湖如明镜开”（《水居八首》其一）。四季节序更替之美则有“长林寒风息，春气蔼如斯”（《庚戌立春日月坡初成》）的霭霭春风，“千林枯木生琼蘂，万叠青山作玉屏”（《辛酉人日依韵和友人舟中赏雪》其二）的莹莹冰雪。品赏自然“乳燕来止，儵鱼出游”（《水居》其四）、“栩栩有舞蝶，啾啾来鸣禽”（《静坐吟四首》其三）的欣欣生意；饜饕造化“光摇高阙迷金掌，云密低空失玉绳”（《辛酉人日依韵和友人舟中赏雪》其三）的变幻之美；玩赏水乡“风竹弄窗翠，水阁澹秋颜”（《吴子往荻秋庵二首》其一）、“水静芙蓉夕，风生芦荻秋”（《晚步》其一）的澹冶秋容；涂抹天地“寒风芦荻含霜白，落日芙蓉映水红”（《秋日饮仲儿圃中》）、“看尽白云青嶂出，听残黄鸟绿阴移”（《水居八首》其三）的靓丽色彩。或写闲雅之趣，心如闲云，心闲似水，

¹ 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38页。

“好鸟有情依古树，闲云无意度高岑”（《西湖十四咏·万松书院》），“一穴清泉百道流，闲心相对共悠悠”（《西湖十四咏·龙井泉》）；或写幽居之欢，梅香催酒，诗兴勃发，“到山春已半，残梅尚盈枝。折来香满屋，佐酒且催诗”（《水居饮酒诗》其二）；或写风物之美，春雨蕨肥，秋螯味鲜，“春雨蕨肥菰米饭，秋风鲈美菊花杯”（《水居八首》其一），“持巨螯兮沽酒，汲惠泉兮烹茶”（《湖干四时歌》其六）。

高氏非如多数哲学家那样率意为诗，其诗刻画内容实则经过仔细推敲而又出之自然，就像高氏哲学那样精微入妙。如《水居漫兴》其十八：“赤日堕于西隅，白月升于东牖。我适于此开樽，佩得金印如斗。”“金印如斗”之譬喻精警老练，肖物之神。又如《西湖十四咏·龙井泉》：“一穴清泉百道流，闲心相对共悠悠。游鱼似解忘机客，故故从容出水浮。”“故故”叠词状游鱼之悠然，效果极佳，得之于杜诗叠词之妙。再如《兰溪道中》：“两岸青山看不尽，红桃白李逼人來。”不仅色彩鲜明如画，动词“逼”极尽舟行观景之妙，动感极强。还可从其律诗中摘录出不少对仗工整、炼词精警、气势流走的对偶句：“片砧传远谷，一鸟度高风”（《望湖亭坐月》），“疏星催晓色，片月冷孤舟”（《夜坐》），“微风荷芰侵筵冷，落日蒹葭动客愁”（《水居宴集和友人韵》）。理学家笔下的水居生活竟如此丰富多彩，理学家笔下的水居景色竟如此绚丽多姿。当然其水居诗又并非以雕词琢句为工，“总不离乎至性之情之所宣泄”¹，而是以性情取胜，以浑成见美。

第二，高攀龙擅长将玄言奥理融于鲜明生动的描写中

“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一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英·柯勒律治《文学传记》）²，高攀龙哲学家的思想资源优势加上艺术家的气质，使得他在表达玄言奥理时左右逢源，善于将深刻哲理寓于生动鲜明的叙写中，很少有玄言诗人或理学诗人的陈腐说教之风。一方面，高氏寓理于景，借形象阐发哲理。如《湖干四时歌》其七：“千山皓兮方晓，五湖冰兮复雪。尽大地兮无瑕，如寸心兮不涅。”晓日朗照千山积雪更显皓皓之白，纷纷飘雪愈显冰封五湖莹莹之洁，经历冰雪的天地清除瑕质，趋于含素抱朴的空明莹洁之本色。高氏于景色描写中，寄寓着不断祛除物欲臻于清纯本色光明心境的理学命题，类于禅宗“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的渐悟修炼方式。这首诗昭示了高氏作为理学家取景与诗人之诗雕琢景物的不同思维方式。诗中副词“方”“复”即是理学意趣关键点所在，强调天地不断经历雪积冰封变得无瑕的过程，实质上隐喻着高氏将“修”³“悟”⁴相结合的悟道体验。另一方面，高氏寓理于事，在生动的叙写中拈出发人深省的哲理。如《和西筑十咏·径行》：“石路多欹仄，踏云高下行。道人心似砥，不见路如坑。”这首诗将哲理寓于山行的体验之中。诗前二句形象地写出山间云雾飘拂方向难辨、石路崎岖难行的山行体验，后二句借以阐发只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才可踏平坎坷成坦途的人生哲理，又抒发了诗人正道直行、不畏艰难险阻的豪情壮志。再一方面，高氏寓理于意境、气象中，其诗呈现出刚健壮大的气象之美，充溢着义与道、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如《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静坐》：“兀兀何为者，朝曦至夕阴。六经疑处破，一气静中深。霄汉孤悬榻，乾坤壮盍簪。五湖秋色满，相守岁寒心。”读者在静中仿佛感觉到“气”在流走，氤氲磅礴成包举五湖、涵盖乾坤的气势，这是理学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明”之境，呈现出儒者浩然正气的感发力量，这种极为刚健的气势在诗人之诗中是很难见到的。诗中又有静坐中对经典的质疑和体悟，有与友人切磋、砥砺的相得之乐，“六经疑处破，一气静中深”句，展示苦思经典后的悟得之乐及天人融合的妙境状态，亦蕴含着儒者不迷信盲从经典的可贵质疑精神，和不立异、从经典中悟得圣道的朴实学风。而所抒之情、所寓之理，又自然有机地融入鲜明生动的诗歌意境中。高氏在诗中，将“儒理”衍化涵融于美的意象、意境、气象之中，或借助诗歌形象再现悟道的精神体验过程，避开了哲理诗人“以理为诗”的枯燥干瘪、玄奥难懂的缺点，拓展了哲理诗的表现技巧，提升了哲理诗的

1 徐永言：《高忠宪公遗集序》，《高子遗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养和堂刻本。

2 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5页。

3 按，“修”指的是读书致知，如诗中“冰兮复雪”。

4 按，“悟”指的是静坐悟道，如诗中“寸心兮不涅”。

艺术水准。

第三，水居诗“逼近陶韦”的清真本色、萧散平淡的诗歌风格

高氏“为诗亦尚清真，而冲澹入古，不事俳佻”¹，这是他的诗歌风格，亦跟他的哲学精神一致。“东林之学，泾阳²导其源，景逸始入于细”³，高氏之学尽精微而致广大，“集有明一代之成”⁴，晚明只有刘宗周可与之相比；另一方面，高氏讲学又倡导“标庸言庸行之矩”⁵，认为学问“道理不向身心上去总是虚语”（《复陈敬伯》），强调务实。高氏认为，精进不已的复性境界就在于回归本色状态：“谓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困学记》），“夫学，性而已矣；夫性，善而已矣……学莫难于见其本色，见本色，斯见性矣。”（《曹真子先生仰节堂集序》）高氏“太和元气一以诗发之”（马世奇《高忠宪公诗集原序》），“其诗皆日常生活中的性情语”⁶，其诗皆是其至性至情之流露，道日常事，写眼前景，摅心中感，毫无矫饰，具有清真本色、萧散平淡的美感。如《水居》其二：“饭饱欣然，荡桨菰芦。菱蔓摇漾，莲花芳敷。今日何日，吾长五湖。其来徐徐，其去于于。”《水居漫兴》其三：“蝉声参差高柳，荷香远近芳塘。一榻凉风午睡，半卷残书夕阳。”诗人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平日所见所思串成一段行云流水，情真意真境亦真，具有陶诗“初看若缓散，熟读有奇句”（《东坡题跋》卷二）的萧散平淡之美。这些诗语气舒缓，语调从容，完全是高氏学人胸襟的真情流露。同是平淡之风，这些诗没有孟浩然诗平淡中的孤愤，也没有王维诗平淡中的萧飒禅意，亦没有柳宗元平淡中的峭拔，更没有白居易平淡中的甜俗。这些诗确实接近陶渊明、韦应物诗歌以及杜甫、陆游、朱熹等人闲适之作的萧散闲逸、恬夷冲淡。

“陶性近道，故有道者之诗多近陶”⁷，陶、韦、杜、陆、朱诸人，均属醇正的儒家思想主导型诗人，剔除了平淡中的戾气，故而有平淡恬夷的儒者气象。后人对他诗歌评价也很高，沈德潜评高氏诗曰：“忠宪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⁸叶德辉《高忠宪公诗集序》卷首题签评曰：“冲淡夷犹，逼近陶韦。”钱穆评曰：“高淡近渊明。”⁹都指出了高氏诗风的平淡恬夷。

三、高氏水居诗的诗史意义

高攀龙“无心学陶，天趣自会，羽翼名教，人不以‘击壤’一派（邵雍诗派）为高，益信定山（庄昶）、甘泉（湛若水）非风雅之宗也”¹⁰。高氏无意作诗人，竟然能获得“无心学陶，天趣自会”“风雅之宗”的极高评价，可见其诗尤其是水居诗在诗史上的重要意义。

第一，高攀龙水居诗代表着东晋以来玄言诗、禅宗诗、理学诗等哲理诗发展的新阶段

哲学家擅长理论阐述，文学写作却不是他们所长，他们的诗多半写得“淡乎寡味”，如两晋玄学家之诗“理过其辞”，唐代衲子之诗“敲板叫街”的打油钉铰，宋、明理学家之诗多堕入“理障”“理窟”、以“鄙俚相高”的泥淖。先论玄言诗。南朝谢灵运以精雕细琢的山水形象刻画打破了玄言诗的通篇论玄格局，但不免留着玄言尾巴。高氏水居诗山水的刻画多与性理的发摅水乳交融，近于陶渊明、韦应物平淡蕴藉的诗风。次论禅宗诗。释氏诗多以山水悟道，《永嘉证道歌》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

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外一种：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69页。

2 按，“泾阳”即顾宪成。

3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49页。

4 陆世仪：《高忠宪公年谱序》，高世宁：《高忠宪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五十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页。

5 吴桂森：《高景逸先生论学语题辞》，高崧等辑：《东林书院志》卷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二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6 钱穆：《理学六家诗钞》，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7 陈龙正：《陶诗衍序例》，《几亭全书》卷五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十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页。

8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页。

9 钱穆：《理学六家诗钞》，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10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页。

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¹释德诚作偈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²前一首论理透辟，但乏诗味，后一首偈语富于理趣，景物、禅理巧妙融合。高攀龙水居诗在山水的形象描绘中亦透出这种禅意理趣。再论理学诗。自北宋邵雍以来，多数理学家诗歌“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³，“导致南宋盛行不衰的‘语录体’‘讲学体’‘浅俗体’等诗体的产生”⁴，这种倾向在明代庄昶、湛若水诸人诗中尤为突出。邵雍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有善用平易畅达语言表达深刻哲理的优点，高氏水居诗看似平淡质朴，实则蕴含深沉，亦有邵雍诗的优点。另外高氏深受朱熹诗歌影响，朱熹写武夷山、庐山山水及平居乡村风景的诗歌，笔调清新活泼，意境高旷闲远，又多寓有“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朱子语录》卷十五、卷十八）的体悟性理、发明圣道的意味，显得理趣盎然，耐人寻味。高攀龙终身服膺朱子，佩服朱子约儒典为韵语“味之而愈旨，研之而愈深，终身所不能穷也”（《朱子性理吟序》）的写作技巧，其水居诗或寓理于景，或寓理于事，或寓理于雍容的气象、鲜明的意境描写中，如盐着水，了不见痕，情、景、事、理妙合无垠，浑融无际，类于朱熹山水景物诗善于营构意境而又富于理趣的优点。

第二，高氏水居诗是晚明地域性文学的典型体现，以“清刚之气”改造江南地域文学偏于柔美的风格

法国丹纳认为每种艺术品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⁵，高氏之学及其诗在特殊的精神气候——水居生活中产生，高氏水居诗鲜明地烙上了江南水乡诗性文化的印迹。其水居诗从取材到意象构建到主旨表现无一不带上“以水为娱”的色彩，诗中意象多与水相关，湖光山色不时在诗中闪现，温润迷人的江南风景不时在诗中流溢。更重要的是，高氏水居诗以儒家积极进取的刚健精神，提升改造江南水乡文化偏于“柔美”的女性化气质，使得江南水乡文化更具有刚柔相济的文化底蕴。当然在高攀龙之前，范仲淹、朱熹、辛弃疾等人以江南地域为题材的诗歌早呈现出柔中有刚的风格之美，高氏对此进一步作了提升改造。在高氏看来，“学必须由静入，静坐者，坦然一切放下，不著一事，不起一念也。果放得下时，即是直心，即是浩气，即是天然本色”⁶。其水居诗多表现他静坐的哲学体验，诗中多呈现儒者探究性理氤氲辉光成浩然气象的刚健之美，即将以前哲理诗中拘执枯燥深奥的玄言串成行云流水般的悠远意境和浑成气象。高氏水居诗诗情画意的意境之美和儒者探究性理氤氲辉光成浩然气象的刚健之美互相辉映，如果前人江南诗词多体现美的特质，那么高氏水居诗多在其中融入“善”⁷的光辉，这是“儒语”⁸渗透浸润江南文化后产生的新型诗歌审美范式。

第三，高氏水居诗代表了晚明东林诗社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

东林书院在讲学的同时，也注重文学“联属同志，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功用，《（东林）会约仪式》规定：“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涤荡凝滞，开发性灵之助。须互相倡和，反覆涵咏每章至数遍，庶几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长之味也。”⁹《东林书院志》中保存了不少同志唱和的诗，东林学派诸人别集中也有少量诗歌，可称之为诗史上的东林诗社或东林诗派。东林诗社诸人如顾宪成、安希范、刘元珍等人作诗很少，赵南星“为诗厌薄七子，刻意濯磨，而步趋北地”¹⁰，不能出其窠臼”¹¹，顾允成

1 永嘉玄觉：《永嘉证道歌》，《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四十八卷·诸宗部（五）》，（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刊行，1990年，第396页。

2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273页。

3 永瑛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击壤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2页。

4 王培友：《论两宋“理学诗派”的文学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春之卷，第78页。

5 马奇：《西方美学史资料汇编》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8～689页。

6 高攀龙：《书友人扇静坐诗后》，《高子别集》卷一，《无锡文库》（第四辑）《高忠宪公诗集等》，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影印民国十五年太仓陆氏刊本），第357页。

7 按，此处的“善”指的是浩然之气与人性本色天然的交融。

8 按，此处的“儒语”还包括“儒家精神”。

9 高桂等：《东林书院志》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七二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10 按，“北地”即李梦阳。

1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页。

“诗为《击壤集》派，亦不入格”（《小辨斋偶存提要》），邹元标诗文“无非讲学之语”（《愿学集提要》）¹，他们多数未能摆脱理学家诗“以理为本，以辞为末”的习气。高氏认为“吾性无外，故夫天地古今之赜，下至羽鳞走植器数，声律之微，无所不当格”（《塾训韵律序》），他在日记中写道：“饭后每诵《诗》一二章，信哉，《诗》之可兴也。每晚读《楚辞》一篇，忠诚恳至，何减三百篇？”²可见高氏将写诗、读诗当作体悟圣道、格物致知的重要方式，他用诗歌记录了他沉潜圣道的心灵律动，描绘了水居周围的山光水色，水居诗明丽鲜明的意境画面与他光风霁月的峻洁品格及涵虚浑灏的圣道有机融合在一起，明显要比东林诗社诸人之诗的水平高得多，代表了晚明东林诗社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要之，高攀龙水居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一代儒宗心灵和哲学的窗口。透过这扇窗，我们发现了哲学家亲近可人的生活情趣和时代震怖的心灵颤动，还原了哲人性理思辩的灵感火花和宁静心境。高氏水居诗“画化”的“化境”之美，去玄言的技巧之高，天近陶诗的平淡诗风，其艺术成就拔帜于一般哲理诗人之上，典型地体现了江南地域文学的特征，代表了东林诗社诗歌创作的最高水平，从而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我们可以认识到，对哲理诗史的研究应该进行文化、哲学、历史等多角度的透视，突破就文学论文学、就哲学论哲学的单一研究模式，在互文共振的作者文本语境中多方面阐发文学、哲学、政治交融的诗史意义。

A Discussion on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And Poetry—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Gao Panlong's Shuiju Poems

Lan Shihong

Abstract: Gao Panlong's Shuiju Poetry has deep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These poems show the elegant taste of life and little heart fluttering brought by turmoil time, and which reflecting the speculative color of philosopher's theory. These poems have some beauty of painting and his skills of erasing cleverly metaphysics is very high, and whose light naturally is the poetry style. Because of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his poems,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general level of philosophical poets, it typically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nan regional literature and represen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Donglin school of poetry. Thus it has important meaning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Key words: Gao Panlong; Shuiju Poetry;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Poetry-history Importance

责任编辑：黄万机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13、1514页。

2 高世宁：《高忠宪公年谱》“万历二十二年甲午（1594）三十三岁”条引，《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五十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516页。